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Prusek Jaroslav, 1906—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他自幼喜欢历史，曾在捷克查理大学主修欧洲历史，获学士学位。1928年后兴趣转为汉学，先后至瑞典哥德堡大学、德国哈勒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深造。1932年，普实克获得了一个访问中国的机会，两年的学术考察，他与中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深入交流。作为一个知识广博、视野广阔、理论扎实的学者，普实克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不仅涉及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学，而且还包括中国的语言与艺术。他对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就颇丰。普实克还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哲学以及文学著作，著作有《中国——我的姐妹》《中国文学史》《话本的起源与作者》等，晚年主持编纂《东方文学辞典》。他享誉国际汉学界，是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与鲁迅及中国文艺家结缘

193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内山书店转来一封从日本东京寄出的信件。写信人就是离开中国在日本作短暂停留的普实克。他希望将鲁迅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请鲁迅提供照片、评价文字，并询问付酬办法。鲁迅于23日复信，24日寄出，同意普实克“随意翻译”，不取报酬；如果一定要表示谢意，回赠一点捷克文书籍或者介绍捷克作家的画像复制品或版画即可。评价文字，鲁迅推荐了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请普实克择用，可以删节修改。8月27日，普实克又来信关心鲁迅的身体健康，同意赠书或赠画作为答谢。鲁迅于9月28日复信再次诚挚表示不要报酬。鲁迅之所以对普实克的翻译工作给予无条件支持，原因写在捷克译本的序言里：“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抒情性”和“史诗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陈 亮

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寥寥数语，表达了鲁迅和普实克这两位作家之间“惺惺惜惺惺”的深情。

普实克对鲁迅的关注最初是由于胡适的推荐。在胡适推荐的优秀作家中，鲁迅在显赫位置，其次还有冰心、郭沫若、沈从文、巴金等。帮助普实克认识鲁迅的还有一个叫王福时的大学生，他常送给普实克一些鲁迅的杂文集。通过这些匕首投枪般的文字，普实克认识了旧中国一些丑恶腐朽的社会现象。鲁迅的《呐喊》也是王福时给普实克的珍贵赠品。普实克回忆说：“这本书使我惊喜交集，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了周围人们的面貌并理解了他们的灵魂，鲁迅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教导我如何去爱他们。从《一件小事》里我认识了在街头的人力车夫的品德。当我在乡间闲步时曾经跟一些贫农聊过天，在他们身上我可以辨认出《故乡》中那位沉静而温和的闰土的影子。同时，我也能分辨得出诸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嘴脸来。终于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沉思的，受着苦难的，主要是正在努力着的中国！”

1937年12月，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合译的《呐喊》捷克译本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鲁迅著作的第一个捷克译本。1951年，普实克感到他的译文没有鲁迅的

原作丰富优美，便对他翻译的《呐喊》进行了重译。当时他的夫人克列布索娃博士翻译了《呐喊》的另一部分作品，又增加上了《野草》的译文，以《呐喊——野草》为书名由捷克国家文学、音乐与艺术出版社出版。1962年，普实克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夏著贬抑鲁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在这篇47页的论文中，有近20页是为鲁迅辩护，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对鲁迅的情感倾向。

此外，普实克在中国结识的作家还有郭沫若、冰心、郑振铎、沈从文等。特别使普实克敬重的是郑振铎——他们认识之初，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文学教授。郑振铎热情地把普实克带到家中，让这位异邦人饱览自己节衣缩食购买的文物古籍，普实克发自内心的地说，他从郑振铎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里学到的都要多。受到郑振铎的感染，普实克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一种狂热的爱。普实克以捷克语翻译了《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中国话本小说集》，以及节译了《聊斋志异》，这些学术成果显然都跟郑振铎的影响和在北平的访书经历密不可分。

享誉国际汉学界

1937年1月，普实克回到捷克，

在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工作。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他继续研究中国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有关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与文学》一书；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汇编在1980年出版的论文集《抒情诗与史诗》。1987年，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该著作最大的亮点有两处：一是较早地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二是澄清了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误解和曲解。普实克所撰《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文也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普实克不是象牙塔式的学者，他在查理大学创建汉语学科并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捷克汉学研究的缘起，普实克功不可没。坐落在布拉格市区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鲁迅图书馆”由他一手筹划和造就，普实克研究中国话本小说有突出贡献，尤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特点与发展具有原创性见解。至1970年，在他引领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以其别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被国际汉学界称为“布拉格汉学派”，在汉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之地。这个学派以捷克汉学家为主体，代表着东欧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并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独特的中国文学研究观点

普实克在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源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使然，也是结构主义理论背景的展现。在这些理论框架下，他细致研究和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叙事策略、类型转换、语言、风格等各方面的问题。

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普实克看来最主要的迹象是在于“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独一性”，并在作品中有所表现。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具有的某些自我调节功能。这恰恰是其他学者所忽略的。“只有当中国人发现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地妙不可言、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整个的中国文学才会将它们悉数反映出来”，这种变化开始是零散的吉光片羽，不能改变整个文学结构的本质。而这种本质的改变最终落实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身上。

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在普实克看来，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下层的、民间的文学潮流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普实克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在语言层面上，“道”是中国哲学的基石与最高范畴，在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可指世界的本体、本原、规律、真理、制度、规则、规范等。“道”字的本义是道路，“道，所行道也”。甲骨文中的“道”字字形是“行”与“人”的结合，表达人在街道上行走之意；金文中的“道”字字形用“首”代替了“人”，强调行走之意。由于“道”是众人共同行走、通行、遵行的通路、坦途、路径，因此，“道”字具有共行、共通、共同、规范、规则、规律等含义。

文言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普实克认为，恰恰是“由于这种对小说的立场，作者们个性的作用反而被强化了”。这些作者都是一些“具有创造力的、性格不受约束的人，是与那些追求功名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从而流露出“锋芒毕露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普实克看来，当小说创作不是被作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消闲，而成为表达个人化文学观念的一种工具时，小说的地位实际上就已经被提升了，因为小说作者已经在内心深处“对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进行了重新评价。虽然这种提升还没有获得主流文人文学的认可，但是在思想内容层面，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以及其现实主义的眼光都使得小说在清代成为比诗歌和散文都更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学样式。

抒情性和史诗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是写实，因为，“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真实性’向来被奉为最高的价值，所谓‘真实性’，也就是对事实的如实记录；‘实’这个字，包含了‘充分’、‘完全’的意思，同时排除了幻想，因为幻想是‘空洞的’，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中”。这种写实性倾向使中国文学“往往显得过于实际，妨碍了文学在富于想象力的小说领域的充分发展”。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他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对文学运动以至文学作品的系统式结构理解；二是对现代文学的精神意蕴的体会，这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最有代表性。李欧梵以“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去综括普实克的现代文学研究；“史诗的”一语指向他结构主义思维的叙事倾向，而“抒情的”一词则显示了他与中国文学的默契知音。

海外汉学家



狗尾草驯化而成的小米

□ 王 雪

全球史中的生物与人

小米的祖先是狗尾草

约16000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在有意识地播种过程中，发现了青狗尾草的天然变异现象。人们选出穗大、苗壮、不落粒、分蘖少的青狗尾草进行特殊培育，使它形成新的优良遗传性状。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优中选优，人们将这些优良遗传性状稳定地传递下去，最终培育出了小米。

小米能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它能适应各种生态条件，特别耐旱。它叶面蒸发量小，在生育期能经济地利用水分，比其他粮食作物需水量少得多。二是它对土壤要求不苛刻，沙土、黏土、碱土均能适应，即使是高山陡坡的瘠薄地仍能获得一定收成。三是它极耐储存，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可以持续储存数十年之久，这在古代备荒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中国史前时期小米的出土地点分布情况判断，其驯化基地大方位在黄河中游地区，具体方位是陕西关

小米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黄灿灿的小米，像历史长河里点燃的火把，满足一个人的一日三餐，也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随着小米的广泛种植，华夏先民逐渐有了剩余粮食、剩余资产，结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以种小米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方式，并开始饲养家猪、家狗、家鸡等畜禽。随后出现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社会组织，最终形成了国家。至此，先民告别了史前时代，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

进入全新的时代后，人们手心摩挲小米的温度，漫溢出人间烟火的味道。《本草纲目》记载：“粟米养肾气，去脾胃中热，益气。”古人发现了小米的医药功效，常吃小米能降血压，防治消化不良，补血健脑安神。最早的酒也是用小米酿造的。根据文献记载，距今大概5000至7000年前的仰韶、龙山时期的古人，就已经尝试着用发芽的小米酿酒，当时酿出的酒叫作“醴”，是甜酒，酒精度很

低。《诗·周颂·丰年》记载“为酒为醴，烝畀祖妣”就是指这种酒。

除了最基本的食物功能外，小米还有许多特殊用途。小米被用作官吏俸禄，《广雅·释詁》云：“粟，禄也。”小米作为赏赐之物，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阐释说：“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梁启超认为小米曾为货币，在《中国古代币材考》一文中说：“古代以粟为币，全国所有之粟，以一部分供民食，以一部分资币材，当岁凶粟乏之时，而两者之用，皆不可须臾缺。”小米也是补官拜爵和减刑免罪之物。汉与匈奴作战，屯戍者众，边粟不足，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小米不单是古人的主要粮食，还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每一粒粟都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小米曾被用于占卜，郑玄笺：“但持粟行卜，求其胜负。”小米被写成了诗，《诗经》就有许多关于粟的诗句，如“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感慨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于是便有了大家熟知的“沧海一粟”这个成语。小米被用来造词，如粟状小粒之金叫“粟金”，粟状花纹叫“粟文”，细微差错叫“粟错”，数量极少叫“粟许”，小国林立叫“粟散”，皮肤受凉起的“鸡皮疙瘩”叫“粟肤”，等等。

小米走向世界

被勤劳智慧的华夏先民驯服的小米越走越远，其意义在世界古代史上不可或缺。小米走向世界主要有西、东两条路线。西传路线上，约公元前

4500年，从长江流域经中亚传入印度。随后又分为两个传播渠道：一是沿地中海北岸，从希腊到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西班牙一线；二是沿多瑙河流域，从东南欧，穿过中欧，直到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地区。从此开创了欧洲原始农业的先河。东传路线上，约公元前2000年，小米经山东半岛或辽东半岛，传入朝鲜和日本。

在世界历史上，小米在农业生产、日常烹饪、医药服用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息息相关。小米在罗马帝国中作为重要作物贯穿于农业社会的始终，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是穷人赖以生存最重要的食物。到了19世纪，西欧的小米才逐渐被小麦、马铃薯、玉米、黑麦和水稻（尤其是前三者）所取代。即使受到其他作物的排挤，如印度河下游、恒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大量集中栽培稻，但仍有大片土地尤其是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小米。

小米塑造了语言文化。小米在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中分别称Cinaka、Chena、Cheena、Chino，都是“秦”或“荆（楚）”的谐音，波斯语则称其Shu-shu，音同“粟”，这不仅能够反映外国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具有一定联系，也可以佐证小米由我国传播出去的历史事实。英语称小米为millet，它来自中古法语，中古法语又来自拉丁语mili-um，所以小米的拉丁学名叫Miilacium，源自印欧语mele，是“压碎”“磨碎”的意思，由于磨成的粉很细小，无法计数，于是有了million（百万）一词。

枝叶葳蕤，籽粒累累。从狗尾草华丽转身而成的小米，诉说着中国人勤劳朴实的来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珍贵礼物。

“道”是中国哲学的基石与最高范畴，在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可指世界的本体、本原、规律、真理、制度、规则、规范等。“道”字的本义是道路，“道，所行道也”。甲骨文中的“道”字字形是“行”与“人”的结合，表达人在街道上行走之意；金文中的“道”字字形用“首”代替了“人”，强调行走之意。由于“道”是众人共同行走、通行、遵行的通路、坦途、路径，因此，“道”字具有共行、共通、共同、规范、规则、规律等含义。

从古文獻来看，至迟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在广泛纯熟地使用“道”这一概念，《老子》是体现这一文化现象的经典著作。《老子》认为语言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准确地描述“道”，于是勉强对“道”进行了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可见，“道”与人们探索宇宙起源的哲学思辨有关。

八角星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天文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图像等考古学证据显示，先民通过北斗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宇宙体系或者说空间与时间体系，“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并衍生出天极、极星、璇玑、太一（天一）、有无等关于宇宙起源的哲学思辨。

太一是太极，太极则是《周易》确立的宇宙的最初状态或者说本体、本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第四十二章则认为太极之前还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是“天数一”或者说“太一”，也就是太极，从而发展了关于宇宙起源“有无”的哲学思辨，显示出儒道两家宇宙观的不同。可见，《老子》是在关于太一以及宇宙起源生成的哲学思辨中，提出了“无”“道”等概念和思想。《庄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在“道”的范畴内，宇宙的起源发展是无始无终的。《老子》《庄子》认为，客观存在而不显现的“道”是宇宙的本体、本原或者说宇宙根本规律，并演化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各方面的规律、规则、规范等，弥纶天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制约着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发展，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道」体现宇宙观

□ 隋云鹏

从而创立了道家学说。

宋代，随着儒释道“三教合一”在哲学上的完成，出现了“道学”。道学之名，先后见于《隋书·经籍志》《宋史·道学列传》等典籍，《宋史·道学列传》收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道学先生的事迹和思想主旨。道学之名虽然载于正史，却是以理学之名流行后世，这显然与朱子理学的兴盛有关。朱熹通过“太极一理”这一思想枢轴对“道”进行了时代解读，发展了道学又孕育出影响更大的理学。周敦颐、朱熹努力将“无极”纳入以“太极”为核心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从而丰富了宇宙起源的“有无”之辨，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任务。道学或者说理学，也成为从宏大宇宙到内在精微世界的学说。

可见，中国哲学中的“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无相生的辩证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既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又是道德的重要范畴，具有体用合一的本质、特征和优势。

汉字里的文明